

南圣湖之思

沈小晓

旅人心语



今年1月,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发现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遗迹,因与已知的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圣湖北并立,而被命名为“南圣湖”。这是埃及考古学史上首次在同一神庙区发现两座圣湖,也是埃及考古学史上唯一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圣湖。

南圣湖位于孟图神庙建筑群内。孟图神庙遗址区(见下图,资料图片)总面积约10.6万平方米,其中方形围墙内的神庙区约2.4万平方米,分布着孟图神庙、玛阿特神庙、哈普拉神庙、圣湖、高台建筑、北大门、6座奥西里斯神殿等多处重要遗迹。立于遗址区内,眼前是历经数千年风化的残柱、墙基与散布的碎石,耳畔风声低回,如历史遥远的回响。我不禁感慨过去这里是如何繁华,如今又是多么沉寂。

走近南圣湖,它并非想象中的“湖”,更像长方形石砌水池,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。低头望去,圣湖四壁由砂岩石块堆筑而成,东壁一側建有通向湖底的石阶,古代祭司由此取水用于神庙仪式。仔细看圣湖四周,还能发现泥砖与红砖修缮的痕迹,如同时光留下的“档案”,展现圣湖历经千年的营建过程。

孟图神庙供奉的孟图神是战神,鹰首人身,是古埃及最古老、最重要的神明之一,亦是古埃及首都底比斯(今卢克索)地区的主神。神庙的兴衰反映了孟图神信仰的变迁与古埃及人的权力斗争,探索这座遗址对解读古埃及和早期人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。上世纪40年代,法国学者曾进行小规模发掘,随后数十年却并未开展正式工作。8年前,这里首次迎来中国考古队,中埃携手,让这座古老神庙缓缓揭开神秘面纱,重现往日图景。

此刻,站在南圣湖遗迹一側,粗粝的风夹杂着沙吹到脸上。我看到中埃考古学家共同蹲在一个探方里,一边用小刷子拂去千年尘土,一边不时地交流彼此看法。这个画面格外令我动容。

8年来,这样的场景已成为日常。中埃考古队队员共同交流技术方法、理念传承,多项考古成果在学界引起不小关注,彼此间建立起深厚友谊。他们并肩工作的背影是文明对话的模样,没有高下之分,平等照亮彼此。联合考古的意义,不在于谁的技术更先进、谁的学术传统更悠久,而在于双方共同的信念:这是人类文明的创造,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遗产。

南圣湖的发现揭示了另一个层面的文明对话。中埃文明都视水为生命象征。在古埃及神话中,世界起源于一片名为“努恩”的无垠原初混沌之水,万物与秩序从中诞生。古埃及神庙中的圣湖,被认为是神圣的水源地,不仅为宗教仪式提供水源,也象征并再现了世界诞生时的初始之水。而在中华文明中,水被赋予更多哲学意义。“上善若水”的哲思与“天人合一”的东方智慧至今熠熠生辉。两大文明因地理环境差异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哲学与智慧,但对水之于生命和秩序的重要认知,却形成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

“联合考古不仅是挖掘过去、守护文明,更是为未来搭建桥梁。”埃及考古队队员亨蒂的话久在我心头萦绕。亨蒂从事考古事业近30年,为更好地了解中国,她开始系统研读中国古代历史。在孟图神庙遗址现场,她看了看脚下的土地,又望向还未发掘出的远处,说道:“我们是在共同面对人类文明的遗产,共同承担守护与传承的责任。”放眼望去,世界各国游客络绎不绝,有人专注拍摄记录,有人在方尖碑前驻足良久。他们心怀对古老文明的好奇而来,又带着历史的回响奔赴世界各地。每一个人,都是文明传承与传播的使者。

穿梭于神庙高耸的巨型石柱间,我不禁想到远方的伊期。那片同样诞生了古老文明的土地,如今正遭受地火侵袭。这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,每一处遗址都是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,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组成。对文明的视视保护,不仅是考古学家或博物馆人的职责,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。这也是全球文明倡议所昭示的:只有以文明对话消弭冲突,以交流取代隔阂,以合作取代对抗,在平等相待、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、交相辉映,才能真正守护人类共同的记忆,为世界和平注入持久稳定的力量。



马来西亚雨林探秘

陈培栋

域外见闻

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向东北行驶50公里,便进入蒂迪旺沙山脉的怀抱。高擎蓝天的鱼尾葵鹤立鸡群,酷似热带鱼尾巴的叶子在空中摇曳。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——东南亚热带雨林的核心理地带,它与亚马孙、刚果盆地并称世界三大雨林区。山间,偶能看见当地土著护林员的身影,他们背着行囊穿行于密林深处,熟练清除盗猎者布下的铁夹子,用GPS(全球定位系统)记录野生动物踪迹,守护雨林的宁静。

踏入位于雨林腹地的马来西亚大汉山国家公园,目之所及绿意盎然。作为东南亚雨林的旗舰物种,龙脑香科乔木无疑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它们笔直挺立,直刺苍穹,高度往往可达六七十米,撑起森林的骨架。龙脑香树干光滑通直,只在顶端分出枝杈,如同雨林中一根根擎天巨柱。其板根尤为壮观,从树干基部向四周延伸出数米高的翼状结构,如一道道厚重石墙,稳稳扎根大地。每逢数年一度的集体开花结实时,成千上万颗带翅的龙脑香种子便从树冠旋转飘落,铺满整片林地,马来西亚也因此成为全球龙脑香特有种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,全国共有约340种龙脑香科植物。

在这片雨林,时间不是一曲独奏,而是一场合奏。龙脑香用百年从种子长为巨木,不急于一朝一夕;大木花酝酿9个月的沉默,只为几日绽放;巴泰族以季节为节,雨季迁徙,旱季驻扎,从不催促土地给予更多。他们各有节律,共享从容。我想,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时间,快慢不同,却同等庄严。或许,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放入生命的和声,做一件愿意等的乐器,而不是着急的指挥。

在这片巨木撑起的绿色穹顶之下,林间偶有神秘的大王花悄然绽放。这种花朵无茎无根,寄生在葡萄科崖爬藤属植物的根部或茎部,终生不与土壤直接接触。其花苞需孕育八九个月才能成熟,绽放时直径可达1米,是世界上最大的花之一。然而这耗费数月积蓄才绽放的花朵,花期却仅有短短数日,之后迅速变黑、枯萎,如一场短暂而盛大的生命仪式。

大汉山国家公园的原始雨林历史可追溯至1.3亿年前,比亚马孙雨林还要早约6000万年。居住在雨林深处的当地土著巴泰族是马来半岛最早居民的直系后裔,属于“奥朗阿斯里”的一支——这个名称在马来语中意为“原初之人”。巴泰族自称“森林之子”,他们不相信土地能被私人拥有,认为自己只是森林的看守者。因而他们不修建固定居所,只随雨林节律迁徙,采食林间野果、饮用山涧清泉,与雨林共生千年,从未打破自然的平衡。如今,仍然秉持这样理念的土著青年加入护林队,或成为国家公园向导,穿梭于祖先走过千百年的林间小径,用祖辈智慧配合现代技术,继续守护这片世界的家园。

女性作家从边缘走向中央

“文心追迹”“成名之路”“冲破樊笼”“声名赫赫”“改写世界”——特展五大主题单元中,女性作家的肖像和手迹尤为引人注目。

生活于19世纪的勃朗特姐妹选择用男性笔名写作,以确保作品顺利出版从而赢得更广泛的读者。“冲破樊笼”单元中,勃朗特姐妹的“柱子肖像”(见图④)是著名展品之一。这幅油画名为《安妮、艾米莉与夏洛蒂·勃朗特》,由其兄弟勃兰威尔于17岁左右亲绘,夏洛蒂(右一)和艾米莉(右二)之间的一道光柱中原有他的自画像,后来被画家用一根粗糙的柱子覆盖,画作因此得名。位于西约克郡的家中,勃朗特家的4个青少年曾在客厅圆桌而坐,共同游戏、写作、画画、办手工报纸,在风雨凄迷的荒原度过许多漫漫长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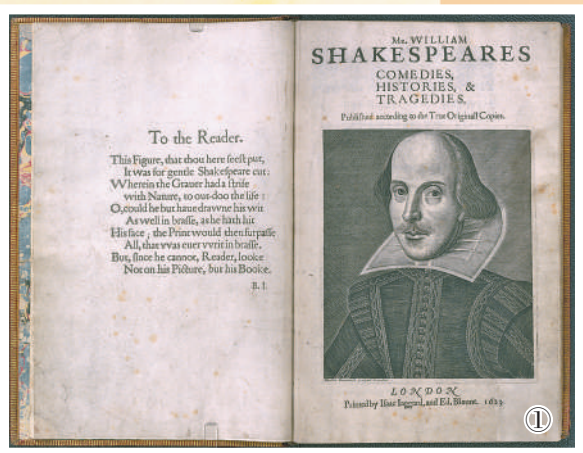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造访他们的故居,惊讶于这样一张不起眼的小桌竟见证《简·爱》《呼啸山庄》《艾格妮丝·格雷》等名作的萌芽,并深深羡慕“勃朗特家的孩子们”用创作共同抵御人世荒凉的手足情谊。或许因多年相伴相知,勃兰威尔笔下的夏洛蒂面容恬静,安妮灵动不羁,“隐士”艾米莉的眼神则像她那些呼唤石楠和星辰的超逸诗篇,越过此时此地,凝聚并消散于空茫。

“文心追迹”单元中,范妮·伯尼的油画像以华丽的“卢纳迪”帽子夺人眼球,她创作了英国最早的女性长篇小说之一《伊夫莱娜》,深受简·奥斯汀等作家推崇,然而她的肖像却未露于小说家这一面,反而塑造了一位时髦女郎。“改写世界”单元中,19世纪诗人伊丽莎白·巴雷特·勃朗宁的油画像目光炯炯,沉静坚毅,她的爱情诗动人心弦,作家本人也因积极投身废奴运动、在作品中揭露社会不公而名垂文学史。

从早先只能隐藏在男性笔名后出版作品,或仅留下个别由亲友绘制的肖像,到不情愿地允许画像被画家和出版商塑造为有利于作品营销的“美女作家”,再到能够掌握自己肖像的话语权,并参与自身职业形象重塑……5个世纪以来,女性作家的写作和出版之路迂回坎坷,日益得到应有的关注,并逐渐大放异彩。20世纪80年代末,一位生活困窘的单身母亲望向列车窗外,仿佛看到一个瘦弱的黑发男孩向她微笑——这正是哈利·波特从J.K.罗琳笔下诞生的瞬间。如今,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“九又四分之三”站台前驻足,伴随哈利·波特成长的一代代读者相信生活中仍有魔法、勇气、智慧、忠诚,还有爱。

“当作品、肖像与传记相互交汇,便构成了一次难得的契机,让我们得以走近500年来最具才华的文学大师。”策展人凯瑟琳·麦克劳德和亚历山德拉·奥尔特在导言中如是说。今天,人们仍在莎士比亚的忌日暨推定诞辰——4月23日,庆祝世界读书日。本·琼森的题诗或许略显偏颇:我们大可以走进博物馆去看作家肖像,然后带着更为立体的目光,开卷,深读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)



16至17世纪,以划时代的创作彰显现代英语作为年轻文学语言的活力。

1476年,威廉·卡克斯顿紧随古登堡的脚步,于伦敦建立英国首家印刷所。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内,我们愈发频繁地看到作者个性成为书籍个性的一部分。“个性”(character)一词的词源恰恰是希腊语动词“印刻”(kharassein)。与此同时,在印刷书籍逐渐取代中世纪普遍匿名手抄本后,作者肖像在奠定作者权威和作品原创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相比泥金手抄本中偶见的以“缮写室中的作者”或“作者向赞助人献上作品”为主题的彩绘细密画,可被复制的版画作者像已批量出现在作品扉页。以玄学派诗人安德鲁·马维尔的《杂诗集》为例,卷首作者像由刻工临摹自早期油画肖像,凸显着作者的某些个性特点。

托版画肖像的福,一些兼事翻译的作家与其翻译对象在对页上结成“共同体”。亚历山大·蒲柏翻译的1760年版《伊利亚特》卷首,左页是满额沟壑、处于吟诗出神状态的荷马胸像,右页是托腮望向荷马的蒲柏,暗示两人已在英语世界被看作荷马史诗的共同作者。这其实延续了一种中世纪传统:译者被看成一类作者。以“英国诗歌之父”杰弗里·乔叟为代表的中古英语作家常常将译作与著作并举,共同列为自己的作品。蒲柏本人曾多次感慨,是荷马译本的商业成功使他得以全职写作。

19世纪以来,作家职业像更倾向凸显“活人感”,比如手持羽毛笔的雪莱、翻阅笔记的济慈、左手压住刚完成手稿的狄更斯、在书房中执笔走神的鲁德亚德·吉卜林、在湖区羊群前手执笔记的碧雅特丽克丝·波特和低头奋笔疾书的J.K.罗琳(见图③)等。比起早期现代的经典作家像,这些“工位照”——哪怕是工位上磨洋工——也更加生动地体现了近现代作家的生活环境、工作习惯和脾气秉性,以及“写作并不总是顺利的”这一基本事实。



以画证文 以迹见心

走进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

包慧怡

关于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有机辩证关系,或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《诗艺》中的“画如此,诗亦然”(Ut pictura poesis)最为著名。这则拉丁短语曾被译为“书画同源”“诗画同质”“诗画一体”,在后世激起无数辩论,莱辛在《拉奥孔》中提出的“诗画异质说”便是个中典例。

一份手稿背后承载着作家怎样的创作历程?一幅肖像又透露出作家怎样的个性?文字与视觉艺术是竞争还是互证?走进今年3月由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国家肖像馆联合主办、大英图书馆参与策划的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: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,135件肖像和手迹以“诗画互注”的逻辑,将5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文学故事向参观者娓娓道来。

作家肖像与作家作品形成张力

作家肖像与其作品之间的张力,早在英国国家肖像馆开馆首藏的莎士比亚“钱多斯肖像”(即《威廉·莎士比亚》,见图②)中就有所体现。这幅油画因早期收藏者钱多斯爵士得名,相传为约翰·泰勒绘制于1610年,被认为是莎氏唯一的生前肖像。特展中,它被安置在展示《第一对开本》的玻璃柜上方。《第一对开本》的标题页(见图①)有一幅马丁·德罗肖特所作的版画肖像,强调该书内容出自莎氏之手——这是莎士比亚离世7年后友人出版的作品集,包含36部剧作,其中一半此前从未刊行。

莎士比亚阔额头、肿眼皮、高发际线等标志性特征在两幅画像中清晰可见。时隔不到15年,“钱多斯肖像”中佩戴单边耳环、垂坠式衣领敞开、神情自然的波西米亚式艺术家肖像,已转化为对开本上发型一丝不苟、轮状皱领方方正正、面容拘谨的经典作家像,耳环这一极具象征性的时尚单品也被舍弃。对开本旨在奠定莎氏的权威剧作家身份,肖像便将他塑造为不朽的文学巨擘和上流绅士——轮状皱领彼时被视为贵族特权。对开本肖像的对页还附有一首短诗《致读者》,来自莎氏的友人兼竞争对手本·琼森:



“你所看到呈现在此的肖像/是为了高贵的莎士比亚所作/刻工在其中与自然竞争/试图比真人画得更翔翔如生/哦,假如他能刻画他的面容般/用黄铜刻画出他的智慧……既然刻工欠缺这份手艺,读者啊,不要看他的肖像,去读他的书。”

这首诗也被后世称为《论莎士比亚的肖像》。琼森在肯定肖像本身逼真的同时,否定了以视觉艺术“刻画智慧”的可能。他劝勉读者将目光从已经看到的莎士比亚肖像,转向尚未读到的莎士比亚文本。早期现代作家对肖像(画)与作品(诗)、表象与实质之间关系的思考在这短短10行“题画诗”中巧妙展开。

以“印刻”彰显“个性”

莎士比亚之外,展览还呈现了诸多早期现代作者的油画或版画肖像。如将意大利体十四行诗“英国化”的都铎王朝早期诗人托马斯·怀亚特,失明后口述创作史诗《失乐园》的约翰·弥尔顿,凭借崇高声望获授英国首个“桂冠诗人”头衔的约翰·德莱顿等。这些作家主要活跃于



图①为私人收藏,图②③④版权所有者均为英国国家肖像馆。

《偷书贼》的书里书外

徐馨

字,长销不衰。小说以“书”为线索,同时展现了战争对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摧残。祖萨克说:“一本书既包含着这个世界,又映射着这个世界。”读《偷书贼》,我想到死于曙光即将到来之际的犹太少女安妮·弗兰克;想到荷兰汉学家施舟人先生的父母因藏匿犹太人遭受牢狱之灾;想到同事沈小晓历经周折采访了在加沙难民营中摆摊的兄弟俩,小书摊的名字是“读你的书”。《偷书贼》将故事背景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,8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并不遥远。纪念历史,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。

祖萨克不仅写战争,书中最打动我的是对人性的体察。“迈克·霍尔茨阿普费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杀死了自己,因为他想活下去。”迈克是莉赛尔邻居家的儿子,他无法面对弟弟死在自己怀中,而同样作为士兵的他活了下来。“是斯大林格勒的雪花,杀死了迈克。”作家写道。

“他对我做了些什么,那个男孩。每一次都是如此。这是他唯一的瑕疵。他踩在我的心上。他让我流泪。”作家借助小说叙述者“死神”的视角说道。这里的“他”是故事中莉赛尔最好的朋友鲁迪。这个男孩有着烛光一样的发色。他会因为饿而偷吃的,也会冒险为犹太人送去面包,是一个将泰迪熊轻轻放在湖



死的“敌人”脸颊旁的孩子,一个渴望得到邻家女孩的吻而不得的少年。作家对世间美好的赞颂像森林中被枝叶掩映的溪水,不经意间流入人的眼里心里。

全书结尾,作者再次以“死神”的视角写道:“我总是或者高估人类,或者低估人类,很少能够客观评价他们……人性何以如此丑陋又如此熠熠生辉。”读到这里,我想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句话:人性所以能够打败人性,仅仅因为是人性。

祖萨克也不仅写人性。《偷书贼》同时也是这位作家写给“文字”的情书。“她用手背滑过书架,听着指甲掠过每一册书脊时发出的声响,就像倾听乐器的演奏或是跑步的声音。莉赛尔笑了。”这是莉



东起德国柏林博物馆岛,西至勃兰登堡门,菩提树大街有“德意志精神空间”之称,是许多人到访柏林的必经之路。1933年5月10日,在紧邻菩提树大街的倍倍尔广场,在德国纳粹鼓动下,两万多册书被付之一炬。这其中,包括卡尔·马克思、托马斯·曼、布莱希特、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。

今天漫步在倍倍尔广场,游人或许会注意到地上有一块4平方米的玻璃板,向下望去,是一组空无一物的白色书架。距离这个纪念装置不远处,地面上镌刻着德国诗人海涅在1821年写下的诗句:“这是一场序幕——人们终将会在烧书的地方焚烧人。”

莉赛尔,一个生活在慕尼黑近郊的德国女孩,曾经从纳粹点燃的焚书堆中“偷”走一本书。那本书被她藏在大衣里,几乎灼伤了皮肤。莉赛尔,澳大利亚作家马库斯·祖萨克笔下的人物,小说《偷书贼》(见右上图,资料图片)的主人公。这本书创作于2005年,20年来被翻译成60多种文

本版责编: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:rmbgj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:张芳曼